

# 巴蜀豪傑魏時珍

(本文插圖刊第54頁)

## ●陳正茂

### 學問修養超越儕輩

魏時珍，本名嗣鑾，字時珍，筆名康高。四川省蓬安縣周口鎮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蓬安地近嘉陵江畔，山清水秀，在川北貧瘠地區特稱魚米之鄉。地靈人傑，賢良輩出。時珍祖父魏寶珊即以樸學名家，稱譽於世。自幼誠篤聰慧，穎悟過人。一九〇八年十五歲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就讀（後併入成都府中）在理學家劉士志門下受「知耻力行」之實學訓練，

與王光祈、曾琦、李劫人、周太玄、蒙文通、郭沫若、胡少襄諸友為同學。後此輩在學術事功皆卓然有成。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時珍自成成都府中畢業，二年（一九一三）赴上海，考入同濟醫工學院（後來之同濟大學），由於天資穎悟，領會特高，精進勤奮；力學之餘，又好廣結善緣，同學中除宗白華、鄭壽麟、謝蒼瑤、沈怡外；友朋中尚有曾琦、張夢九、李璜、左舜生等莫逆，均為爾後五四時代頭角崢嶸，領導風騷之才子。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時珍自同濟大學電機預科畢業，翌年（一九一九）王光祈、周太玄、

曾琦、李大釗等人於北京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簡稱「少中」），時珍因少中宗旨與己志趣相合，乃為最早參加學會的會員之一。時「少中」發行「少年中國」月刊，時珍常在「少年中國」月刊發表有關科哲之文章，對當時中國數理科學之闡揚，貢獻不少。又「少中」初創時，會友相勉向學，時珍與曾琦、周太玄、張夢九、宗白華等人組「學術談話會」，每週必聚而談各自讀書心得。茲引曾琦「戊午日記」數則，便可窺時珍赴德前夕之學問修養。

民國七年十一月三日：「晨偕時珍、太玄赴法國公園，為學理之談話，時珍所談為『微積分在科學上之價值』，太玄所談為『金本位與銀本位之比較』，予所談為『代議政治』，皆上次會面時，各人所擬題目也，惟予自願學識誦陋，不及二君精到遠矣。」

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時珍、子章來訪，共為學術談話，時珍所講為『天文學』，太玄所講為『價值與價格』，夢九所講為『國權主權統治權之區別』，予所講為『哲人政治』，子章初入會，僅旁聽而已……」

民國七年十二月八日：「午後偕夢九，太玄赴吳淞同濟德文學校訪時珍於其校內講堂，共為學術談話，予講『叔本華哲學大要』，時珍講『時間及叔本華哲學之一段』，太玄講『貨幣之數量』，夢九因未預備，故未講演……」

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時珍及宗白華君來訪，因留便飯，午後循例作學術談話，宗君談『德國詩人巨特第一名作』，時珍談『思想之缺點』，予與太玄，夢九等因未閱書，故不克標題談述，頗自歉也……」

上述數則日記，再佐以曾琦自言：「時珍近於中西學皆有心得，朋輩中修業之勤，進德之猛，斷推此君為第一矣」。可見曾琦知人之明及時珍之名不虛傳矣。

### 留德攻讀數理哲學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時珍同陳劍脩等七十餘人由上海乘法國保來加郵船赴德留學，初就讀於福朗克府大學，同去者尚有王光祈、張夢九諸君。由於三人在德生活艱困，乃相謀合作自給之道，其法係由時珍講解德報所刊佈之內容

，而由王、張二人據以撰成中文，分向上海「申報」及「新聞報」投稿，以微薄稿酬，維持生計。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九月，因感於國人對德國文化之生疏，乃與「少中」同仁王光祈、張夢九、宗白華、孫少荊等人發起「中德文化研究會」，以介紹研究中德兩國文化為宗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時珍轉往哥丁根大學繼續深造，專攻數理，師從于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和波朗（Max Born），學習偏微分方程，在當時的數學物理領域前沿做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國最早研究偏微分方程的學者之一，以後著有「偏微分方程論」及論文若干，在數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在校期間，時珍最感幸運的是能受到第一流大師希爾伯特教授和波朗教授的關愛器重，另外更在哲學家列而松（Leonard Nelson）等權威學者的門下，親聆教導，受益匪淺。時珍興趣廣博，除攻讀數理之學外，也酷愛哲學。曾在哥丁根大學學生會講演比賽中，以「康德與馬克斯對話」一題，用數理邏輯及康德思想，大事批判馬克斯之唯物辯證法，語驚四座，一時風靡哥大。時珍既醉心於數理之學，因而他對於愛因斯坦（Einstein）的「相對論」也產生濃厚的趣味，二十世紀初期，相對論學說已在歐美相當盛行，但在中國知識界仍十分陌生，為此，時珍決心要將這學說傳播到國內，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時珍在「少年中國」月刊三卷七期特自編「相對論專號」一期，專門介紹相對論學說，一時國內學術界爭相傳誦，國人最早了解愛氏之說，時珍可謂第一人。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適有山東臨城發生孫美瑤劫車綁架案，內中有外人數十位，案發後，西方輿論大譁，列強主張共管中國鐵路，法國巴黎各報更是誣中國為「匪國」。李璜有見於此，憂心忡忡，急電在德養病之曾琦，請其赴法，共謀對策。曾琦赴法後，一面與何魯之等人組織「旅法各國體救國聯合會」外，又鑒於中國旅法共黨份子之囂張，痛心之餘，更覺有組織之必要，中國青年黨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即將呼之欲出了。關於加速曾琦組黨的決心與脚步，李璜曾說：「慕韓早有建黨救國，旅法以來，見其所最器重的青年活動分子如趙世炎、李合林等，不聽其勸告，而竟加入共產黨，不告而去俄，慕韓甚為痛心。他深感青年人愛活躍，只憑理論，而無組織，無行動，絕不足以維繫之。及其於本年赴德赴比遊歷中，已在秘密與好友鄭振文、王建陌、魏時珍諸人談及組黨事。」而曾琦在其自訂年譜也述及「中國青年黨乃於是年（按：指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成立於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街，予與李不韙、張子柱、李璜、胡國偉、梁志尹、何魯之皆當時發起人，然予組黨之動機，實起於柏林養病時，鄭振文、王建陌蓋最先參預者也。」文中雖未提及時珍，但以曾琦與時珍之交誼兼佐以李璜之回憶，筆者敢大膽假設，曾琦創立中國青年黨，時珍扮演最早獻策謀劃之人當無疑義。此年，另有一事值得一提，時共產黨人朱德及老同盟會員孫炳文俱在德國留學，因不諳德語，時珍受邀為其德語家庭教師。由此可見時珍程度之高與德語之流暢。

## 返國任教成大川大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時珍得哥大哲學博士（按：德國大學制度，理科概屬哲學院）。次年，取道柏林經西伯利亞回國，同行者有鄭壽麟等人，行抵上海，即應聘任其母校同濟大學教授，並為青年黨的「醒獅」週報主編「科學特刊」，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一月始離滬返成都。

成都大學創立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七年（一九二八）春，時珍初任成大教授，在此之前，時珍之友人應聘任教於成大者有李璜、曹四勿、呂子芳、鄭壽麟、謝蒼瑤、胡少襄、周太玄、陳啓天諸先生，益以時珍來成大任教，一時德法返國碩儒，盡薈萃於斯，極其鼎盛。暇時亦至師範大學任數學教授。時珍初到成大時，即經李璜之介，加入中國青年黨，從此畢生成為一忠貞的青年黨員。十八年（一九二九）時珍任成大數理系主任，十九年（一九三〇）升理學院院長。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成都大學與師範大學、四川省公立各專門學校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首任校長為王兆榮，繼為任叔永、張真如，王、任、張三位校長知時珍為名重當世的數理權威，皆禮聘時珍繼續執教，並一度繼任川大理學院院長。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九月，時珍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之邀，復入德進修，旅德期間曾晤好友王光祈，光祈責以「君回國七年，儼為大學教授，以君之能，余以為亦且有所表現，而顯寂然無一語告人，君得無辜負社會與其所學也耶

。時珍適桌上有國內新出雜誌若干種，即取一冊以示光祈說：「如此者，亦得為文耶，黃茅白草，彌望皆是，余固不願與此儔同類而並稱也。」其不輕易著書為文，故作高論之謙沖心態可見一般。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冬回國，仍任川大講座，時共黨紅軍亂川，時珍執教如常，不為所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國數學會成立時，時珍即當選為理事兼任雜誌編委會委員。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戰軍興，政府召開「廬山談話會」，時珍與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啓天、余家菊、常燕生獲邀參加，獻替國是意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張真如未能真除川大校長，教育部任程天放掌川大，並以疏散為由，遷峨嵋授課，時珍亦從此結束其與川大十餘年的任教關係。

### 創辦川康農工學院

時珍自從加入反共的中國青年黨後，黨內同仁愛其才華，常互囑不以黨務煩之，俾其安心講學著述，影響青年思想。然時珍究係性情中人，蘆溝橋事變以來，「中青」與政府共赴國難，奔走於前敵後方不息，眼見同志紛紛戮力報國，奮勇殺敵，時珍基於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良知血性，自不能置身於抗戰之外，乃毅然決然的出任中國青年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兼黨辦之「敬業中學」校長，並常以己資接濟校務發展，調動督導，宵旰勤勞，工作之繁重，倍於往日。但時珍却甘之如飴應付裕如。關於此點，雲孫在「懷魏時珍先生」一文中曾提到：「就中青創建和發展的

經過說，教師和學生，差不多是黨的主要構成分子……以四川成都而論，李璜、陳啓天兩人到成都大學任教影響是極大的可惜他們在成大任教的時期都很短，李璜僅半年，陳啓天僅三月，便在一黨政治的重壓下，被迫去職，離開成都了。任教時期甚長，能够經常為中青吸收成都和全川優秀青年的，要算魏時珍、何魯之、彭雲生三位先生。就中魏時珍因為多年主持成大、川大理學院、私立敬業中學和國立理學院，及其前身川康建設學院、川康農工學院的緣故；對中青西南黨務的發展，更有特殊的貢獻。」柳浪先生也說到，青年黨四川黨務，以李璜、魏時珍、楊叔明三先生出力最多。不僅如此，於黨務之暇，尚注重農工教育之提倡，為了此事，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時珍專程赴渝謁蔣中正委員長，面陳四川農工建設之重要，得蔣委員長允助其私人興學，造就川康農工人才，此即「川康農工學院」肇基之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七月二十二日，川康農工學院董事會在重慶正式成立，董事為張羣、陳布雷、王世杰、張道藩、李璜、左舜生、任鴻隲、鄧錫侯、劉文輝、盧作孚、黃季陸、胡次威及魏時珍。董事會推張羣為董事長，並通過魏時珍為院長，院址設於成都三槐樹街，是年秋，即招生開學，計有應用化學、農墾、工商管理三系。

除了忙於黨務，創辦川康農工學院外，抗戰中期，時珍目睹國力有再衰三竭之勢，為激勵士氣，振奮人心，乃於講學治事之餘，抽暇為成都大學生演講進化原理與人生價值；及見共黨勢

力日張，人慾橫流可慮，復發為己立立人之義，駁斥盲信。凡此講演大綱，具發表於成都「新中國日報」，試圖經由輿論之傳播，導彼時左傾之激進青年，迷途知返，回歸正道。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時珍因川康農工學院經費短絀，為謀學校生存，赴南京請教育部長朱家驊幫忙解困，唯迫於形勢，無功而返。幾經磋商，決定採取權宜之計，於三十五年秋天停辦私立川康農工學院。另由教育部籌措專款，利用農工學院的教學設施，新辦國立成都理學院，仍由時珍主持院務，專門為國家培養數理基礎學科的高級人才。時珍從川康農工學院到國立成都理學院，始終堅持學人辦學，任人唯賢，尊師重道，為國育才的宗旨，倡導樹立尊重科學、尊重真理。嚴格教學，認真讀書，刻苦實踐，勤奮探討，由約而博的學術研究風尚，為川康地方建設造就了一批批優秀人才。

### 危城落日離開川大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一月，代表青年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當選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秋，自成都飛廣州，參預閩錫山內閣所召集之全國教育會議，無奈廣州撤守，華南淪陷，川東、川西相繼棄守，戰事逼近成都，且夕難保。時政府急備撤離專機，接運重要人士，時珍由朱家驊，抗立武急電請其飛離危城，然時珍以教職員遣散經費未能領取發給，責任在身，不肯輕言離去。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二月底，成都變色後，國立成都理學院合併於四川大學，時珍隨理學院到川大，危城落日，時珍被迫離開川大。四十年（一九五二）一月二十五日，時珍因曾任青年黨中央委員及國大代表，被捕送入成都南較場「政訓班」隔離審查，學習改造，勞改未久，得友人胡助的幫忙，找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張瀾設法營救，張瀾寫信給周恩來，後由周恩來通知川西行政當局妥為處理，六月二十四日，時珍終於平安返家。一九五一年八月，四川大學正式聘任時珍為數學系教授，從整個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初，時珍先後在川大開設了「偏微分方程」、「數學物理方法」、「理論力學」、「相對論」等課，作育英才，貢獻良多。

### 九七高齡逝於蓉城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七十五歲的時珍，離開杏壇，撰長篇自述「我的回憶」，退居家舍，安度晚年。退休後，時珍深居簡出，每天定時看報、閱覽，聽廣播、看電視，自得其樂，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時珍八十三歲，尚獨力完成「孔子論」一書，論述孔子仁政愛民，有教無類，禮樂修身，啓蒙後世，功不可沒。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春，時珍以將屆九十高齡，德國哥丁根大學為這位六十年前獲得該校數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專門頒發了金禧博士學位特別紀念獎狀，以表彰他在半個多世紀中從事數學科研工作，為增進中德之間學術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貢獻。七十四年（

一九八五）及七十六年（一九八七），時珍友人德國科朗數學研究所所長漢斯·柴威教授及美國加州大學數學大師陳省身教授也分別至川晤時珍，為孤寂晚年帶來不少安慰。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十一月，他的老友李璜病逝臺北，時珍得知，倍感哀傷，兼以染上惡疾，身體日差，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六月八日，時珍終因食道癌病逝於成都第八人民醫院，享年九十七歲。

### 全心信仰國家主義

魏時珍處世待人以誠，重然諾，常謂「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蓋有人隨時藉其君子性格而欺瞞之，其覺察亦不在意也，其為人謙遜，不寡言，亦不多言，言必有據，言之有物，其言邏輯推理，科學層次，條理謹嚴，井然有序，蓋學科學數理故也，善文而少文，惜墨如金，亦時珍文章一大特色，其文學素養極佳，涉筆成趣，洗煉謹嚴又不失情逸氣過，豪邁磅礴，治事不苟，以短小精悍著稱。左舜生曾說：時珍天性近於治學，不僅對於他的本行數理造詣甚深，即對於一部分的中國書籍也比別人讀得有心得。他所發表的文字，無論是談數理，或其他普通問題，都能深入浅出，從條理上可看出一種樸素的美。

時珍原學數理，但也愛治康德之學，歸宿於忠恕之道，篤信孔道與康德學，認為二者相得而益彰。在人生問題上，時珍以為德人康德的學說與我國儒家的孔孟見解大致吻合。據康氏的學說，凡物的價值，皆有所待，是相對的。獨至人生，假如它有價值，則其價值是絕對的，它無所待

。康氏曾將命令分為兩種：一是假言命令，一是定言命令。自然科學上的自然律，是假言命令；倫理學上的道德律，是定言命令。自然物的價值，是有所待的，故無自性；嚴格說來，它有存在而無價值。人生在世，他能自決，有服從道德律，也有違反道德律。服從者，謂之善人，或有價值的人生；違反的人，吾人斥之為惡人，或無價值的人生。因為道德律所待，故滿足道德律的人生，其價值亦無所待。它是有自性的，絕對的，它才算是真正的價值。此論頗似孟子所言：「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所謂則，即是我們所謂道德的最高原則。他所謂固有，即是我們自有的理性。而此道德理性却是「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換言之，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內在的，無待於外的，孟子所言，時珍以為和康德所見異常相近，中西兩大儒的人生哲學居然不謀而合，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此外，時珍的倫理哲學觀，頗受康德派哲學家列而松（L. Nelson）的影響，列而松的倫理哲學，共分兩部：一曰義學，一曰仁學。他以為義是命令，而仁則是一種期望。義是命令，故義不可以違；及乎義者，方能稱為君子，其不及乎義或違反乎義者，斯則謂之小人。仁是一種期望，故仁可以不及。達於仁者，固是美德。其及乎義而未達於仁者，亦不得謂為惡行。因為美德是

機會的巧合，故我們只能期待，而不能求全。善行是人類行為所能勉強，故我們不但期待，而且還要責備，我們可以概括的說，盡義是人生的善化，達仁是人生的美化，這便是康德派論仁的大意。

在政治思想方面，時珍主張吾人要有狂熱的信仰，此乃成功之要素，他說：假如我們把歷史上的大事業，在其成功上去觀察一下，我們便會覺得，他們在客觀上，其存留於社會的影響的善惡，雖往往有天與地的分別，但是在主觀上，他們的首領與黨衆，都有一種共同的、淪肌浹髓的信狂。這些首領與黨衆，不管其外界的仇敵與譏笑如何，他們對於其所信仰的，總是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去求其實現。這些首領與黨衆，不管其理想之遠近與險易如何，他們對於其所斬嚮的，總是始終如一，繼續不斷的去共同努力。當他們運思凝神，選擇手段的時候，誠然是用剝繭抽絲的理智，以求其期於至當。然而當他們怒馬彎弓，實地作爲的時候，他們便用如火如荼的感情，拋去一切的游移。這樣的信狂，是成就任何歷史大事業所必需。

換言之，時珍以爲：在一定條件之下，信狂是大事業，尤其是革命事業成功的充分條件；所以吾人欲革命，不可不有主義上的信狂，吾人於敵黨，雖不可不攻擊其主義上觀察的內容，但不可蔑視其主義上主觀的信狂。也因這種對主義上的狂熱信仰，時珍對青年黨國家主義之信仰十分篤信。他曾說：青年黨的主張絕對正確，必會放射它的光芒，而致成功的一日，但完成不必在我。

。我的一生覺得信仰國家主義而爲中國青年黨的一員，感到十分安慰與光榮。

### 堅絕反對馬列邪說

所以他是相當反對馬列共產主義的，他說：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以爲經濟的現象，是隨正、反、合進行的，則是經濟也是變動不居的，問題是經濟是隨時變遷，不知唯物史觀是否有無變遷。假定其不變，則依馬克斯之意，唯物史觀只是經濟的映影，形既變了，影烏得不變？苟其不變，還能稱爲映影麼？假定其變嗎，則唯物史觀便不能成立。因此時珍以爲馬克斯以正、反、合的辯證法來解釋唯物史觀的經濟型態，根本是自相矛盾。

盾，不合邏輯的。

時珍研究學問，喜歡將數學、物理、哲學三者，混成一道討論，時珍以爲單習數學，往往偏於太玄；單習物理，往往偏於太實；單習哲學，往往偏於太空。若是將他們三者揉成一氣來研究，那麼，玄者不至於太玄，實者不至於太實，空者不至於太空。而且從玄之中，可以見其精；從實之中，可以見其理；從空之中，可以見其常。因此他以爲吾國青年最乏者，即科學思想，將來當作革新青年思想之努力，務必將吾國青年空泛之腦筋加一番密緻之陶鑄，使其對於事物，皆不作膚淺之論調，時珍一生以科學報國，其道即在此。

聖文叢書

#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譚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